

# 中国当前社会问题的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

李 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可分为三类:民生类问题、社会公正类问题和健康安全类问题。对不同类别社会问题的关注群体的特征进行区分,可以得出影响公众对社会问题感知的因素和机制:(1)个人生命历程和城乡因素会与特定的社会问题相关联;(2)作为个人困扰的生活压力会明显地强化公众对社会问题的感知;(3)经济状况与教育程度这两个因素对不同行类型社会问题的感知影响方式不同。对民生类问题的感知而言,经济程度有重要的负向影响;对社会公正类问题的感知,教育水平是更强的驱动因素;对健康安全类问题的感知而言,经济程度和教育水平同是正向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感知;民意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2)06-0096-07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众多的研究者认为,当代社会问题的丛生与近代的工业化、都市化浪潮带来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究其原因,在于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一方面造就了人类社会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形态上的巨大改变,一方面也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制度的解组、社会行为的失范、社会心理的失调随之增多,与之相应的社会问题便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议题。

经历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目前中国进入了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但同时也步入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多发地带。近几年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以及贫富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差距扩大,贪污腐败严重等有关社会公正的问题,一直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与这些社会问题的公众化相关联的,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和集体抗争事件发生频仍。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关注并解决好的。本文即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sup>①</sup>三次调查的资料,从公众意见的视角,对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的类型、关注人群、影响因素加以分析。

## 一、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类型及其变化状况

关于社会问题的定义头绪繁多,但以某类社会现象造成的公众伤害面或波及面的幅度作为是否社会问题的判定,这一方式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美国学者Joel M. Charon认为,社会问题的四个要件之一是“某类社会条件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sup>[1]</sup>,与此类似的界定还有“使全体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社会进步发生障碍”<sup>[2]</sup>，“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妨碍社会大部分或一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sup>[3]</sup>。但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大部分”或“一部分”公众是多大范围(比例)却没有一定之规。CSS三次调查中一共列举了20项社会问题请公众评价其严重程度,我们以其中至少一个年度有10%以上的公众认定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项目作为具有公众共识的社会问题。

通过表1的列举可以看出,三次调查中具有

<sup>①</sup>“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Chinese Social Survey)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一项大型纵贯社会研究调查。该调查覆盖全国近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样本量在7 000~8 000份之间。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第一次的调查时间为2006年4-8月,第二次为2008年5-9月,第三次为2011年6-10月。

收稿日期:2012-08-16

作者简介:李炜(1962-),男,陕西西安人,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从事社会分层、社会调查方法研究。

公众共识的社会问题共有 11 项,分别是“物价上涨”、“看病难、看病贵”、“收入差距过大”、“贪污腐败”、“住房价格过高”、“就业失业”、“养老保障”、“食品安全”、“教育收费”、“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上述问题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其一是涉及百姓生计的民生保障问题,如“物价上涨”、“看病难、看病贵”、“住房价格过高”、“养老保障”、“失业就业”等;其二是有关人身健康和安全的问題,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其三是有关社会公正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和“贪污腐败”。这三类问题中,民生保障类的社会问题三次调查中都排位在前,基本上涵盖了 1~8 位的大部分社会问题;社会公正类的社会问题排位大多在 3、4 位,仅次于民生类问题;健康安全类问题排位相应在后。这些较为稳定的排位序列反映出公众对不同类型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的差别。

表 1 社会问题综合排序比较(2006 年、2008 年、2011 年)

社会问题类别	2011 年 N = 6465		2008 年 N = 7137		2006 年 N = 7061	
	百分比	排序	百分比	排序	百分比	排序
物价上涨	58.9	1	63.5	1	—	—
看病难、看病贵	43.0	2	42.1	2	56.2	1
收入差距过大	30.6	3	28.0	3	32.4	3
贫富分化	—	—	—	—	—	—
贪污腐败	27.9	4	19.4	6	27.5	4
住房价格过高	24.2	5	20.4	5	13.1	7
就业失业	22.3	6	26.0	4	32.5	2
养老保障	16.5	7	17.7	7	25.9	5
食品安全	16.2	8	—	—	—	—
教育收费	9.9	9	11.4	9	19.3	6
环境污染	8.7	10	11.8	8	9.8	9
社会治安	8.1	11	9.0	10	12.9	8
征地、拆迁补偿不公	4.7	12	2.9	12	3.8	11
进城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	4.1	13	3.7	11	7.8	10
雇主与员工的矛盾	1.2	14	2.1	14	2.1	12
其他	1.2	15	2.3	13	0.9	13
说不清	13.4	—	11.5	—	8.7	—

CSS 三个年度的社会问题调查结果相比,还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1)民生保障类问题的公众关注度一直保持高位,但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比例随时间进程明显下降。比如“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养老保障”、“教育收费”等问题,自 2006 年到 2011 年间都有较大比例的下降。这些变动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

政府关注民生,加大各项社会保障事业的举措的效果。(2)社会公正类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的趋势,反而严重程度有所上升。对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的现象,公众认为严重的比例一直在 30% 上下,“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自 2008 年的 19.4% 增加到 2011 年的 29.3%,提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3)健康安全类的社会问题,公众关注的变动不大,“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三个年度基本维持在 10% 上下,“社会治安”的严重程度甚至有些轻微缓解,自 2006 年的 12.9% 下降到 2011 年的 8.1%。

## 二、社会问题的关注人群

虽然社会问题被视为“影响相当数量人的公共麻烦”<sup>[4]</sup>,但社会公众各自的境遇和利益诉求不同,他们对于各类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敏感度也有所差异,这导致在现实中社会问题所影响的公众往往有“小众化”的趋势。因而,从社会政策研究的角度而言,区分社会问题的关注人群是十分必要的。根据 CSS2011 年度的调查资料,笔者从区域和个人特征(年龄、就业状况、职业、经济状况、教育程度)等方面逐个分析了每类社会问题所对应的关注人群。

1. 物价上涨问题:平均比例为 58.9%。在各类人群中,都把物价上涨排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首位,不同年龄、职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的公众群体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可以说,目前物价上涨是波及公众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社会问题。

2. 看病难、看病贵:平均比例为 43%。从城乡来看,生活在农村的居民认为是严重社会问题的比例为 48.7%,远高于城镇居民;从年龄组来看,55 岁~64 岁和 65 岁以上两个年龄组的人群认为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47.5% 和 51.7%;从经济状况来看,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最低 1/5 的低收入群体<sup>①</sup>对此问题最为敏感(49.3%)。因此,可以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主要影响人群是农村居民、老年人和低收入者

<sup>①</sup> 笔者根据调查中家庭人均收入的分布,将其划分为五个等分人群: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最低 20% 的群体)、中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次低 20% 的群体)、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处于中间 20% 的群体)、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次高 20% 的群体)、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最高 20% 的群体)。

群体。

3.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 平均比例为 30.6%。这一问题在城乡之间、不同的年龄组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不同的教育程度和职业人群之间差异十分明显。具体而言,文化程度越高,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比例也就越高。在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有 38% 的人认为此问题严重;在职业群体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对贫富分化的反响非常强烈,高达 44.4%。

4. 贪污腐败问题: 平均比例为 27.9%。和对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的关注人群特征十分类似,大专以上学历程度者关注程度较高(36.4%),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对此的敏感度甚高(分别为 37.4% 和 46.8%),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群体的关注度也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 31.8% 和 33.9%)。由此可见,上述两项有关社会公正类的问题,其主要的关注人群是富有知识、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带有白领职业特色的精英群体。

5. 住房价格过高问题: 平均比例为 24.2%。房价高企的关注人群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大中城市的居民中有近 1/3 (32.9%) 认为这一问题严重,小城镇居民这一比例也达到 28.3%;从年龄段上看,3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对此问题关注的比例高达 35%。从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的群体对此问题关注的比例分别为 33.4% 和 35.9%;家庭人均收入属于中高和高两段的人群中关注此问题的比例为 28.7% 和 33.3%;职业群体中,白领类的职业人群关注住房问题的比例都在 30% 以上,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中关注的比例高达 42.6%。以上分析说明,住房价格问题的针对人群主要是生活在城市区域,特别是发达地区城市的年轻白领人群。

6. 就业失业问题: 平均比例为 22.3%。关注这一问题的人年龄集中在 18 岁~24 岁,他们认为就业失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比例为 36.7%,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排位第二,仅次于物价上涨。从区域来看,就业失业问题主要危及的是小城镇,其居民中关注此问题的比例为 28.3%,其中,18 岁~24 岁青年人群关注此问题的比例竟高达 43.6%;从教育程度来看,中等以上教育水平的青年人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更为急切,在 18 岁~24 岁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分别有 41.4%

和 47.8% 的人认为就业失业问题严重。另外,那些身处无业失业状态的公众,对就业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也体认更深,他们中有 44.6% 的人认为这一社会问题甚为严重。由此可以看出,就业失业问题主要涉及的群体是城镇中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青年群体。

7. 养老保障问题: 平均比例为 16.5%。和就业失业问题涉及人群相反,对养老保障关注的主要是老年群体。55 岁~64 岁和 65 岁以上两个年龄段中,认为养老保障是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比例分别为 21.3% 和 24.7%,高出平均水平 6~8 个百分点。相比城镇人口,农村居民对养老保障的关切更深(农村居民关注比例为 21.1%,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居民关注的比例分别为 12.3% 和 15.3%),农村的老年人口关注尤甚,55 岁~64 岁和 65 岁以上的农村人口中,认为养老保障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比例高达 27% 和 36.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还不充足,养老金水平较低的现状。由此可见,养老保障问题的主要针对人群是农村的老年群体。

8. 食品安全问题: 平均比例为 16.2%。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比例为 24%。从人口特征上看,关注食品安全的公众有年轻化、高学历、高收入的特点。在 18 岁~24 岁和 25 岁~34 岁的中青年中,关注者的比例最高,为 19.8% 和 23.4%;教育程度为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关注比例为 21.9% 和 27.2%;家庭人均收入处于最高 1/5 的人关注比例为 28.3%,明显高于其他收入群体;具有中产阶级和白领特征的职业群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度都在 25% 以上,和处于蓝领地位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和农民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说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人群是城市的中产和白领阶层。他们对食品安全的注重,反映了这些群体对健康和生活品质有较高的要求。

9. 教育收费问题: 平均比例为 9.9%。教育收费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关注度虽然不是很高,但在各群体之间的差异却很小,说明公众对此问题的严重性的共识较为一致。相比而言,35 岁~44 岁年龄段的人对此关注的程度最高,为 14.8%,这大概和这一年龄段的人正是学龄儿童、青少年的父母有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有子女的家庭往往会更为关注教育收费问题。在 25

岁~44岁的人口,有子女者关注此问题的比例是无子女者的2.8倍(13.8%:4.9%),因而对教育问题关注的主要是学生家长群体。

10. 环境污染问题:平均比例为8.7%。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关注群体是中青年人,其中,18岁~24岁的群体中认为它是严重社会问题的比例最高(14%)。25岁~34岁和35岁~44岁组的比例次之,分别为10.8%和10.6%。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关注的比例也随之上升,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最高1/5群体的关注比例分别为14.7%和11.3%。从职业上来看,和食品安全的关注者相似,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负责人的关注比例最高(为17%),专业技术人员次之(15%),企业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的关注比例也在11%以上,均高于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民。但工人群体的关注度也颇高,达到了13%,这也许和他们的劳动环境更容易接触污染物有关。因此,可以说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者包含两类群体,一类是对生活质量诉求较高的中产和白领群体,另一类是工作条件和环境中存在工业污染的工人群体。

### 三、社会问题意识的影响因素

社会问题意识指的是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知觉、关注、评估和改变的意愿。社会现象是如何被人们界定为“社会问题”的?它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这一问题在社会问题的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见解。持“事实说”者认为,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和发生的社会现象,而无关于人们对之如何反应;持“反应说”者认为社会问题是人们对种种客观社会现象产生的某种社会反应,它以态度、评价、期望等方式来体现人们对某种社会问题的意向;持“双重性质说”者认为社会问题具有原生社会事实和派生社会反映双重性质<sup>[5][6]</sup>。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认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和关注既有其客观要素,也有主观建构的成分。在下面将以多元统计分析来呈现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的客观与主观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公众的社会问题意识,是他们的客观境遇与主观建构交织的结果。客观境遇可具体划分为:(1)个体生命历程。从社会角色和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人生的不同阶段,所要承担的角色和因应的难题(task)是不同的,因此与这一历

程相契合的社会问题的关注自然不同。在此项研究中,生命历程用不同的年龄分组作为指标。(2)生活压力。每个家庭对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生活压力,比如家人无业、失业、工作不稳定,家中有病人医疗开支大等等都感到较为棘手。这些“个人的烦恼”如果和某项社会议题关联起来,就会强化个人的社会问题意识。CSS2011年调查中向受访者询问了家庭中的12项具体的生活压力,笔者将采用其中7项与社会问题有关联的题目作为测度。(3)生活和居住的区域。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在生活 and 居住方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存在着城乡间的二元格局,因此城镇和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将城乡的区分划分为农村、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三类。(4)经济状况。生活中的个人困扰是社会问题的强化剂,但遇到同样生活压力的家庭,可能会因经济状况的好坏缓解或加剧其困苦,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们对相应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本文采用五等分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作为测度经济状况的指标。

影响公众社会问题意识的主观建构性因素,笔者选择了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作为指标。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对社会的期望愈高,对社会问题也就越加敏感和关注。

笔者以是否将某个社会问题判定为严重为因变量,以上述影响因素为自变量,采用了Binary logistic回归的方法对表1所列前10位社会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限于篇幅,仅选其中6项社会问题(民生保障类问题、社会公正类问题和健康安全类问题各两项)列表分析如下。

1. 民生保障类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在就业失业问题的回归模型中,年龄组的影响整体是显著的。和最低年龄段(18岁~24岁)相比,其他年龄段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就业失业”是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率都明显要低。从生活居住区域来看,小城镇居民认为就业失业是严重社会问题的比数(odds)是农村居民比数的1.435倍,而农村与大中城市之间差异并不明显。教育程度对就业失业问题的关注度影响的整体效应也是明显的,教育程度越高,认为就业失业问题严重的程度也就越强,大专以上学历和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关注率是初中文化程度者的1.464倍和1.372倍。生活压力的影响甚为明显,遭遇到“家人无业、失业”困境的家庭比没有

遇到这一问题的家庭,在就业失业问题的发生率上高了91%。

养老保障问题的回归模型中,年龄效应和城乡的影响也都十分明显:年龄越大,认为养老保障是严重社会问题的发生率也就越高,55岁~64岁年龄组在这一问题上的发生率是参照组18岁~

24岁组的3.674倍,65岁以上组是参照组的5.275倍。小城镇居民和大中城市居民对养老保障问题的关注明显低于农村居民,他们的关注率分别是农村居民的0.779倍和0.681倍。有“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生活压力的家庭对养老保障问题的关注率是没有这一问题的家庭的1.68倍。

表2 就业失业问题和养老保障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因变量	就业失业问题				养老保障问题			
	B	S. E.	Sig.	Exp ( B)	B	S. E.	Sig.	Exp ( B)
男性	-.050	.059	.404	.952	-.115	.071	.106	.891
年龄: 参考组								
18~24岁			.000				.000	
25~34岁	-.775	.097	.000	.461	.572	.160	.000	1.771
35~44岁	-.649	.093	.000	.522	.690	.154	.000	1.993
45~54岁	-.530	.097	.000	.589	.980	.155	.000	2.665
55~64岁	-.867	.113	.000	.420	1.301	.158	.000	3.674
65岁及以上	-1.076	.130	.000	.341	1.663	.161	.000	5.275
城乡: 参考组								
农村			.000				.000	
小城镇	.361	.075	.000	1.435	-.250	.095	.009	.779
大中城市	.052	.083	.533	1.053	-.384	.104	.000	.681
生活压力*	.648	.068	.000	1.911	.519	.110	.000	1.680
教育程度: 参考组								
初中及以下			.000				.266	
高中中专	.316	.081	.000	1.372	-.036	.107	.739	.965
大专及以上	.381	.097	.000	1.464	-.229	.141	.105	.795
家庭人均收入: 参考组								
低收入			.000				.000	
中低收入	.024	.094	.802	1.024	-.147	.102	.148	.863
中等收入	.007	.094	.942	1.007	-.327	.107	.002	.721
中高收入	-.288	.101	.005	.750	-.530	.120	.000	.588
高收入	-.338	.111	.002	.713	-.396	.132	.003	.673
constant	-.766	.103	.000	.465	-2.153	.153	.000	.116
	N = 6555      -2L <sup>2</sup> = 6965				N = 6555      -2L <sup>2</sup> = 5252			

\* 生活压力在两个回归模型中的题目不同,在就业失业问题中是“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在养老保障问题中是“赡养老人负担过重”。

饶有意味的是,家庭人均收入对于这两项民生保障类问题的影响都是负值,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访者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认为就业失业问题和养老保险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比例就会降低。换言之,在民生保障类问题中的问题意识产生过程中,经济状况起到了缓解的作用。

2. 社会公正类问题。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年龄、城乡和家庭人均收入三类变量均无显著

影响,只有生活压力和教育程度的效应是显著的。遭遇到“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家庭,比未遭遇者在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度上要高23%左右。高教育程度者(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度是初、高中文化水平者的1.473倍。贪污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的效应不明显,教育程度和它在收入差距问题中的作用类似,高等教育程度者对贪污腐败问题更为敏感。经济状况对贪污腐败问题的作用也是显著的,具体说来,中高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对贪污

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的感知要明显高于低收入者。

表 3 收入差距问题和贪污腐败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 (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因变量	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				贪污腐败问题			
	B	S. E ,	Sig.	Exp ( B)	B	S. E ,	Sig.	Exp ( B)
男性	. 236	. 054	. 000	1. 266	. 534	. 056	. 000	1. 705
年龄: 参考组								
18 ~ 24 岁			. 160				. 733	
25 ~ 34 岁	. 212	. 092	. 022	1. 236	. 022	. 094	. 815	1. 022
35 ~ 44 岁	. 092	. 091	. 314	1. 096	-. 020	. 93	. 829	. 980
45 ~ 54 岁	. 075	. 096	. 437	1. 078	-. 092	. 098	. 350	. 912
55 ~ 64 岁	. 207	. 104	. 046	1. 230	. 050	. 1 - 6	. 636	1. 051
65 岁及以上	. 062	. 113	. 583	1. 064	. 41	. 114	. 721	1. 042
城乡: 参考组								
农村			. 097				. 057	
小城镇	-. 151	. 072	. 034	. 859	-. 165	. 074	. 026	. 848
大中城市	-. 035	. 074	. 642	. 966	-. 131	. 077	. 088	. 877
生活压力*	. 208	. 057	. 000	1. 232				
教育程度: 参考组								
初中及以下			. 000				. 025	
高中中专	. 040	. 077	. 603	1. 041	. 089	. 078	. 254	1. 093
大专及以上	. 388	. 088	. 000	1. 473	. 243	. 090	. 077	1. 276
家庭人均收入: 参考组								
低收入			. 148				. 036	
中低收入	. 107	. 087	. 216	1. 113	-. 013	. 091	. 887	. 987
中等收入	. 119	. 087	. 171	1. 126	. 106	. 089	. 235	1. 112
中高收入	. 199	. 092	. 030	1. 220	. 203. 093	. 029	1. 225	
高收入	. 027	. 102	. 792	1. 027	. 240	. 100	. 017	1. 271
constant	- 1. 192	. 104	. 000	. 304	- 1. 255	. 101	. 000	. 285
	N = 6555			- 2L <sup>2</sup> = 8131	N = 6555			- 2L <sup>2</sup> = 7787

\* 生活压力在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中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调查中没有具体的生活压力题项和贪污腐败相对,故而在模型中略去。

3. 健康安全类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两类问题同属健康安全类的社会问题,它们的影响因素的作用也十分类似。对环境污染问题而言,低年龄组的问题意识最为强烈,25岁以上年龄组对环境污染的问题的关注度均不及18岁~24岁年龄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大中城市的居民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敏感度低于农村和小城镇居民。教育程度越高,经济状况越好,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敏感度越高。

对食品安全问题而言,年龄越大对此问题的敏感度越低。65岁及以上年龄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率仅为最低年龄段的65.3%。从城乡区域来看,小城镇和大中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在食品安全的问题意识上更为凸显,他们的关注率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334倍和1.639倍。从教育程度看,中、高等教育程度者的关注度要高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群体。经济状况越好,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敏感度也就越高。

表4 环境污染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因变量	环境污染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			
	B	S. E ,	Sig.	Exp ( B)	B	S. E ,	Sig.	Exp ( B)
男性	-.052	.084	.533	.949	-.213	.069	.002	.808
年龄: 参考组								
18 ~ 24 岁			.00				.000	
25 ~ 34 岁	-.313	.128	.010	.718	.312	.111	.005	1.366
35 ~ 44 岁	-.322	.126	.011	.724	-.021	.114	.851	1.022
45 ~ 54 岁	-.635	.144	.000	.530	-.190	.124	.126	.827
55 ~ 64 岁	-.654	.163	.000	5.20	-.118	.136	.387	.889
65 岁及以上	-.824	.190	.000	.439	-.426	.157	.007	.653
城乡: 参考组								
农村			.000				.000	
小城镇	-.059	.106	.578	.943	.288	.094	.002	1.334
大中城市	-.568	.121	.000	.566	.494	.094	.000	1.639
教育程度: 参考组								
初中及以下			.014				.027	
高中中专	.144	.166	.218	1.154	.45	.093	.008	1.278
大专及以上学历	.375	.128	.003	1.454	.071	.105	.497	1.074
家庭人均收入: 参考组								
低收入			.000				.000	
中低收入	.216	.149	.145	1.242	.238	.133	.073	1269.
中等收入	.295	.146	.043	1.343	.328	.130	.012	1.388
中高收入	.571	.146	.000	1.771	.581.129	.000	1.788	
高收入	.696	.156	.000	2.005	1.057	.131	.000	2.878
constant	-2.077	.150	.000	.125	-2.324	.138	.000	.098
	N = 6561		-2L <sup>2</sup> = 4155		N = 6561		-2L <sup>2</sup> = 7787	

综合上面对于不同类型社会问题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的结论:

第一,生命历程因素和居住区域因素对社会问题意识的影响,是和特定的问题主题关联的。比如,对就业失业和养老保障此类与生命历程阶段性有关的社会问题,年龄区分的作用就甚为明显,但在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等类型的问题上就无甚影响。

第二,生活压力这一类客观存在的“个人困扰”对社会问题意识的产生有着明确的增强作用。社会成员在具体生活层面的境遇恶化,会更加明确地导致他们关注在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

第三,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这两项影响因素在不同的社会问题类型中,其作用机制和结合方式有所不同。对于民生保障类问题而言,经济状况与对应的社会问题的意识状态是负向作用,经济状况越好,因应个人困扰的潜能越大,也就可以淡化对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的感受。对于社会公

正类问题而言,教育是主要的驱动要素,教育程度越高,问题意识越强,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公正类问题的主观建构色彩较浓。而经济因素在此类问题上的影响作用不很明确。对于健康安全类社会问题而言,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共同产生强化问题意识的作用,反映出公众在生活品质和价值理念上的双重期望。

参考文献:

- [1] JOEL M. CHARON. 社会问题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费孝通. 社会学概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 [3] 陆学艺. 社会学[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
- [4] 朱力. 社会问题的理论界定[J]. 南京社会科学, 1997 ( 12 ): 13.
- [5] 雷洪. 试析社会问题范式及其理论见解[J]. 江汉论坛, 1996 ( 5 ).
- [6] 叶启政. 有关社会问题基本性质的初步检讨[M]//当前台湾社会问题.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81.

(责任编辑: 杨大威)